

# 陸生書寫中的台灣想像與重構

——以蔡博藝《我在台灣，我正青春》與張怡微《因為夢見你離開》為例\*

黃鈺婷

墨爾本大學亞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 摘要

自2010年台灣開放中國大陸學生來台取得學位，至今已逾10年，期間累積了許多陸生出版的文學著作，這些作品對於兩岸年輕族群具有相當的文化影響力。本文以蔡博藝的《我在台灣，我正青春》和張怡微的《因為夢見你離開》為例，關切陸生實際來到台灣以前對台灣的想像，如何因為他們的在台求學經歷而被重構。蔡博藝與張怡微書中同樣提及中國對台灣過度美化的幻想，想像台灣是保存中華文化美德的典範。兩人來到台灣之後，對台灣的社會卻有非常不同的解讀。蔡博藝的作品雖然延續兩岸一家親的情感想像，對台灣的民主制度卻有所批判，質疑台灣民主制度移植到中國的可行性，而張怡微的作品避開政治討論，描述自己為台灣的「外人」，她筆下的「台灣人」沒有任何的「典型」，都是個體，都是她生命中偶然的相遇。她的書中詮釋陸生的台灣求學路為一個不圓滿的夢想。本文主張，蔡博藝與張怡微書中所呈現的台灣夢碎與重構，可被視為陸生認識台灣主體性，修正自身國族與文化認同的過程，有助於「去典型化」目前在中國以單一中國性（Chineseness）為基礎的台灣想像。

關鍵詞：陸生書寫、蔡博藝、張怡微、兩岸關係、台灣想像

\* 本文為外交部補助2020年台灣獎助學金部分研究成果。本文於筆者訪問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時完成，謹此致謝。並感謝兩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本文已根據審查意見盡量修改。

# Re-imagining and Re-constructing “Taiwan” in PRC Students’ Writings:

Cai Boyi’s *I am in Taiwan, I am Young* and Zhang Yiwei’s *For Dreaming of Your Leaving*

**Phyllis Huang Yu-Ting**

Sessional Lecturer  
Asia Institute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 Abstract

In 2010,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passed new laws which allowed student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to pursue an academic degree in Taiwan. It has almost been ten years since the first group of PRC students arrived at the island. During this period, these students have published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literary works which have had a significant cultural influence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This paper treats Cai Boyi’s *I am in Taiwan, I am Young* and Zhang Yiwei’s *For Dreaming of Your Leaving* as case studies, examining how these works present the authors’ changing imaginings of Taiwan after moving there. It argues that their narratives of Taiwan have transformed from a Chinese utopia or a cultural model of China to a complex cultural entity with its own subjectivity. In Cai’s work, she underscores emotional ties across the Strait, yet doubts the applicability of Taiwan’s democratic system to the PRC. In Zhang’s work, she sees herself as an “outsider” along with other lonely minority groups on the island and interprets her Chinese character’s study experience in Taiwan as an unfulfilled dream. This paper argues that Cai’s and Zhang’s differing narratives of Taiwan help “disenchant” the over-positive impression of the Sinicized “Taiwan” that has prevailed in the PRC.

Keywords: PRC Students’ Writings, Cai Boyi, Zhang Yiwei, Cross-Strait Relationship, Imagination of Taiwan

# 陸生書寫中的台灣想像與重構

## ——以蔡博藝《我在台灣，我正青春》與張怡微《因為夢見你離開》為例

### 一、陸生十年

2010年8月陸生三法在台灣通過實施，<sup>1</sup>2011年928位來自中國大陸六省的學生來到台灣，開始了所謂的「陸生元年」。<sup>2</sup>自此之後，每年都有大約兩千到三千名中國學位生來台就讀。夾雜著台灣各界不同的眼光與看法，陸生成為各大專院校裡常見的成員。與交換學生不同的是，<sup>3</sup>2011年開放的學位生，<sup>4</sup>居住在台灣的時間相對較長，對於台灣社會文化的觀察也相對較為深刻。開放陸生將近10年後的今日，<sup>5</sup>很多人已取得學位返回中國，並在各領域影響著中國。<sup>6</sup>更有為數不少的陸生於在台求學期間或畢業後，出版了關於台灣的專書與文學著作，其中多描述他們在台的政治文化體驗。本文以蔡博藝的《我在台灣，我正青春：第一屆陸生來台求學記事》和張怡微的《因為夢見你離開》為主要文本，探問作者「台灣想像」的建構歷程，關切他們對台灣的想像如何因為此求學經驗而再形構。

蔡博藝和張怡微都是2011年第一屆來台的中國學位生，張怡微更同時具有交換學生與學位生的經歷。二人在台灣停留期間幾乎重疊，均是2010年第一次拜訪台灣：蔡博藝參加旅行團來台，而張怡微是逢甲大學交換學生。之後兩人均在台灣繼續求學：蔡博藝在淡江大學取得學士學位之後，繼續進入台大城

1 陸生三法包含《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大學法》以及《專科學校法》。

2 黃重豪、賈士麟、蘭桃、葉家興，〈陸生元年的扉頁〉，《陸生元年》（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13.04），頁47。

3 交換學生居住在台灣的時間大多介於4個月到1年之間。2008年以前來台修業期間以4個月為限，之後放寬為1年。

4 雖然就制度面而言，大陸學位生比較接近「留學生」，但大部分陸生並不認為到台灣求學是「出國」。

5 2020年4月中國政府單向宣布暫停2020畢業生赴台就讀，不過已經在台灣讀書的舊生不受此限制。

6 其中一個具體的例子是劉二囍。劉二囍於2012年至東海大學就讀建築研究所，在2013年在台灣出版《亞細亞的好孩子》一書，書中曾提及他對誠品書店的深刻印象。2014年他回到廣州，開設了一間以誠品為典範的24小時書店，並以1200Bookshop命名，紀念他在台灣徒步旅行1200公里的經驗。

鄉所碩士班就讀；而張怡微則在政治大學中文系取得博士學位。兩人停留在台灣的期間皆達7年。《我在台灣，我正青春》於2012年由聯經出版社發行，是蔡博藝至今唯一的文學類作品。這本書以散文的文體記錄她來到台灣第一年的感想。書寫於年輕的20歲，這部作品筆調生澀，更充斥著許多不成熟的評論與謬誤。但值得注意的是，它的文化影響力遠高於文學價值。《我在台灣，我正青春》獲得2012年亞洲周刊十大好書，並於2013年發行同名中國版本（內容與台灣版本略有不同）。早在發行此書之前，蔡博藝的短文〈我在台灣，我正青春〉就在中國大陸的人人網上廣為流傳，蔡博藝因此竄紅，這本書更是目前陸生書寫中最暢銷的著作。

年長蔡博藝5歲的張怡微，<sup>7</sup>書寫筆調和風格與蔡博藝大相逕庭。張怡微的《因為夢見你離開》於2015年在中國大陸出版，是她三部關於台灣作品中的第二部。其他兩部分別是2013年的《都是遺風在醉人》與2016年的《雲霧如故鄉》。<sup>8</sup>相較於蔡博藝的著作，屬於直白寫作風格的大眾文學，17歲即獲得中國大陸新概念作文比賽一等獎的張怡微，<sup>9</sup>是一位在中國頗具名氣的多產作家，無論在書寫風格或是文體上均展現出強烈的純文學特質，承繼了張愛玲的海派風格。《因為夢見你離開》是短篇故事夾雜散文的作品集，共收錄了4篇短篇故事與9篇散文，其中包括2013年獲得第35屆聯合報文學獎的作品〈奧客〉。張怡微曾戲稱，相關台灣主題的作品是她賣得最好的書。<sup>10</sup>

兩位陸生作家選擇了不同的書寫策略來詮釋他們在台重疊的停留時期。儘管兩部作品中作者所敘述的來台動機相似，皆因他們對台灣的美好幻想，但兩人來到台灣之後所重構的台灣意象卻截然不同：蔡博藝的作品傾向以「大中

7 蔡博藝出生於1992年，而張怡微出生於1987年。

8 2013年的《都是遺風在醉人》除了第一部分三篇是較長篇幅的散文，第二、第三部分是2-3頁的迷你短文，介紹台灣的風景名勝居多或是作者的讀書心得，由於每篇篇幅甚短，屬隨筆性質，內容較為駁雜，因而筆者選擇了《因為夢見你離開》為文本。再者，《雲霧如故鄉》出版於張怡微來台5年之後，考慮到「認同」的可變性與移動性，為與蔡博藝的《我在台灣，我正青春》相互比較，故選擇兩書出版年代較相近，張怡微書寫於2013與2014年的作品。

9 新概念作文比賽始自1999年，是中國大陸萌芽雜誌社針對30歲以下青年作家所舉辦的徵文活動。在二十一世紀初期頗具重要性，培植了許多目前在中國大陸文壇活躍的80後作家，韓寒、郭敬明、蔣方舟，張怡微等人都是因為此作文比賽而進入文壇。

10 張怡微，《因為夢見你離開》（中國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15.01），頁199-200。

華」情感概念投射在台灣，企圖建立一種兩岸一家親的印象，但作品中卻時常透露她對台灣政治制度與文化的批判與懷疑。而張怡微的作品則時時強調著「偶然」與「異鄉人」的意像，以一種旁觀者的立場，描繪台灣社會。她的作品清晰的定位自己為客居台灣並與之交錯的「外人」。在這兩種迥異的敘述中，「台灣」的形象與意義如何被重構修正，而這樣的敘述又如何反映出作者對於自我認同的思考，將是本文探究的問題。

## 二、陸生書寫與台灣文學

若把陸生書寫視為一文類，它的崛起相當迅速，相關作品的出版高峰期介於2012至2013年之間。根據胡俊鋒的研究，此兩年期間由陸生執筆，在台灣出版的專書多達8本。<sup>11</sup> 即使過了高峰期，仍陸續有陸生的專書出版，例如近期中國交換學生鄒雨青在2016年由獨立作家出版社發行的《原來是醬紫：陸生眼中的台灣大不同》。陸生書寫的短文也常在網路上廣為流傳，例如：世新大學學位生廖海珊在2019年發表的〈這些年，我們被騙來台灣〉。廖海珊在Facebook持續以「廖小花的隱性台灣」為名，就她在台灣的生活經驗為主題發表短文。有許多陸生選擇他們較熟悉的中國市場，出版相關專書。其中以張怡微最值得關注，她是第一個以台灣為主題連續發表專書的「陸生」作家。<sup>12</sup>

台灣舉辦的文學獎在推動陸生書寫，扮演重要角色。旺旺中時集團《旺報》自2011年以來，每年舉辦兩岸徵文比賽。<sup>13</sup> 蔡博藝即以〈我在台灣，我正青春〉一文，獲得2012年徵文比賽優秀獎。廖海珊的作品亦在2019年獲獎。這兩位作者在陸生書寫的領域中小有名氣，與他們獲得此獎項不無關係。而張怡微則選擇參與在台灣更具代表性的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與台北文學獎。她在台灣就讀博士班期間，已在台灣的眾文學獎中屢獲佳績，其作品散見於台灣與中國的文學雜誌。

11 此8本著作不包括學術研究專書。胡俊峰，《台灣不是我的家：陸生在台的認同衝擊》（台北：獨立作家，2014.07），頁51。

12 張怡微已經從政治大學博士班畢業，並任教於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雖然有過於簡化之嫌，因為她已非「陸生」，但為強調她在台灣的求學經歷，這裡暫且將她歸類為「陸生」作家。

13 行政院陸委會也曾在2011年到2015年舉辦過兩岸交流紀實文學獎，不過之後就改變型態停辦文學獎項目。

目前針對陸生的研究數量並不多，大部分集中在教育、社會科學或政治領域，主要研究陸生對台灣教育的滿意度<sup>14</sup>與陸生來台之後對統獨看法的改變。<sup>15</sup>在台灣文學領域，尚無針對陸生書寫的研究。歸咎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陸生出版的作品多屬大眾文學（或娛樂文學）。常見的文體多是抒情散文敘事，最普遍的主題不外乎對台灣風土民情與社會制度的介紹，或是作者的在台遊記。內容大同小異，觀察的面向也大致相似。除了滿足讀者對於這一特殊身分群體的好奇心之外，多數作品就寫作技巧與文學價值而言，並無太大的創新與貢獻。另一方面，「陸生」在台灣屬於政治敏感群體，雖然實際上具有「留學生」的性質，但由於台灣與中國兩方敵對且模糊的政治關係——尤其是中國政府與學界常以「同文同種」來論述兩岸的文化關係——以致台灣文學學者對於如何分類陸生書寫，更為謹慎。一個顯著的例子就是《旺報》的兩岸徵文比賽。以2018年（第八屆）與2019年（第九屆）的比賽為例，每年評審團中，只有一位成員與台灣文學背景勉強相關：分別是2018年台大外文系教授廖咸浩與2019年作家楊渡。其餘評審都是來自中國，非台灣文學背景的編輯、教授，甚至是中國軍事節目總監與副台長。足見，此文學獎已將關於兩岸關係的文學收編在中國文學的範疇。另外，來自中國的年輕學子，自小接受「一個中國」的思想教育，陸生書寫呈現的國族與文化認同，與當前台灣文學領域所強調的台灣主體性價值觀多有相左。因之，難以將陸生書寫置放在台灣文學的領域解讀。

縱觀解嚴以來的當代台灣文學作品，多將敘事重點放在建構台灣獨特的歷史與文化價值和認同上，尤以挖掘、重述台灣歷史為要。後殖民論述成為建構台灣主體性的主要理論架構，探討台灣在歷次不同殖民經驗後，如何形成一個混雜融合的新主體。由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的後殖民史觀可窺知一二。在台灣文學急於尋求國際化之際，近十年來，美籍評論家史書美所主張的華語語系論述（Sinophone Studies）為台灣文學提供了跨國性的重要理論基礎，將

14 例如：周祝瑛、楊雁斐，〈國際化另一章：第一屆畢業陸生滿意度調查初步報告〉，《教育研究月刊》259期（2015.11），頁27-38。

15 例如：王嘉州，〈短期來台交流陸生之社會接觸與政治態度變遷初探〉，《遠景基金會季刊》17卷4期（2016.10），頁1-42。

台灣視為海外華語語系社群的一員，認為台灣正逐漸脫離大中華主義單一「中國性」的枷鎖，展現出獨立於中國政治地理疆界外，與台灣在地經驗融合的特殊華語語系文化。無論是援引後殖民理論或是華語語系理論，源於鄉土文學與本土化運動的台灣文學，無疑展現出「根植本土」，「抗衡中國」以及「擁抱世界」的強烈企圖心。<sup>16</sup>

不可諱言的「根植本土」與「擁抱世界」，已成為台灣文學的思想主軸。建立台灣主體性的同時，台灣文學其實已經混雜了各種跨國文化的元素與情調。吳明益的《單車失竊記》與陳玉慧的《海神家族》即為顯著的例子。然而，或許因為台灣文學具有與「中國性」和「中國認同」抗衡的特質，當代台灣文學作品中鮮少觸及對共產政權下當代中國或中國人的描述，更少關注中國人眼中的台灣。少數提及當代中國社會，或是當代兩岸關係的，多半出自外省作家的作品，特別是1990年代散見於各報的返鄉紀行，或是二代外省作家因為旅行，探親或工作的中國行書寫；其中具代表性的作品包括駱以軍的《遠方》和郝譽翔《一瞬之夢》。這些作品，大多都將論述重點放在台灣和中國現代化與文化發展進度的落差上，描述中國為「沒有精準法律邊界，人與人之間的計較衝突仍倚賴著既原始又精算的人情世故和權力位差（恫嚇、陪笑臉，去ㄨㄚ、關係，塞菸塞酒，或是天花亂墜的評理分析）的蠻荒國度」。<sup>17</sup>另外，常被歸類為海外華人小說家的章緣以自身客居中國的經歷為基礎，對於移居中國的台商社群與中國社會的互動，也有深刻的刻劃。台商與台商的家人，在章緣的作品中常被定義為與中國一般人民分開生活的特殊上層階級。她的作品中常描述主角居住在「已陸續被日本人台灣人入侵」的「新建的高檔小區配有會所綠地和大門警衛」。<sup>18</sup>這些作品對中國「貧窮」，「衛生水準差」，「文化低落」的描述，伴隨台灣解嚴後所建構的自信感與自我認同感，成為當代台灣文學裡中國論述的基調。這樣的詮釋，或許呈現出中國人民生活的某些真實面向，但面對中國在經濟上的快速崛起，生活水準的提升與文化影響力的擴張，

16 邱貴芬，〈新世紀台灣文學系所面臨的挑戰〉，《台灣文學研究》1卷2期（2012.06），頁26-27。

17 駱以軍，《遠方》（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2003.06），頁36。

18 章緣，〈雙人探戈〉，《更衣室女人的告解》（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18.10），頁226。

這樣偏向單一的負面想像，投射出台灣文學領域對於「中國元素」的排斥與警戒。

筆者認為，開放中國學位生來台就讀已邁入第10年，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陸生書寫與台灣文學的關係。在高度全球化的今日，認知人口移動對本土文化所造成的影響與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已成為基本且重要的課題，遑論中國是台灣最大的鄰國，兩地人口的相互遷徙已成常態。根據陸委會的統計數據，從2011年至2018年，來到台灣的中國研修生總數已超過18萬8千人，<sup>19</sup>而2018年在台灣就學的中國學位生總人數也達9,000人。<sup>20</sup>即使每年招生的人數（約2,000到3,000人之間）並無明顯增加的趨勢，在過去10年之間，陸生在台灣的存在逐漸成為台灣常態的社會與文化「現象」。姑且不論陸生書寫多少已經影響了中國與台灣年輕讀者對於兩岸關係的看法，就目前台灣文學包容多元化的走向而論，雖不必須將陸生書寫納入「正史」，至少此文類展現了2011年以來在台灣居住的一群中短期「移民」的生活經驗與視角，可被視為挑戰／豐富台灣文學正統架構的新聲音，其意義可與近年來台灣文學界推動的移工文學相互比擬。兩者都呈現外來移民眼中的台灣。葉佳怡在提及移工作品和來台的中國人作品時，她說道：「這類視角對於重新想像『台灣人』的內涵應該也是不可或缺的文本」。<sup>21</sup>雖然移工與陸生具有相當大的社會背景與角色位階差異，吳慧娟認為移工書寫是「打造台灣國族認同和創新國際關係的重要文化產物」，<sup>22</sup>有助於台灣在人權議題上自我審視，更鞏固了台灣在國族認同上一直追求的族群平等方向。陸生書寫具有相似的特質，它們多著重描述台灣生活經驗對作者所造成的「文化衝擊」，借此提出對中國當代社會的反思和檢討。無論陸生作者對台灣是傾慕或否定，他們對於「台灣性」（Taiwanese-ness）的觀察與詮釋成為作品的重要特徵，顯示「台灣」無法被置於單一中國性的

19 研修生指的是短期來台修習學分的學生，要求較為寬鬆，以申請制入學，繳交學分費，但不能獲得台灣學位。

20 中華民國大陸委員會，〈陸生來台研修及修讀學位統計〉（來源：<https://www.mac.gov.tw/cp.aspx?n=A3C17A7A26BAB048>，檢索日期：2020.03.04）。

21 阿潑、葉佳怡，〈倖存者的行進——阿潑、葉佳怡的〈小說家訪後〉交換筆記〉，《文訊》13卷3期（2016.11），頁62。

22 吳慧娟，〈文學敘事與人權想像：移民工文學獎〉，《中外文學》48卷3期（2019.09），頁105。

框架解讀，相反的，作品中所描述的「台灣文化」反映出華語語系社群文化的「在地性」(place-basedness)特質，提供台灣讀者對於何謂「台灣性」的反思。<sup>23</sup>正如史書美所言，「台灣性」的邊界，應是「所有台灣多元文化的極限，而這些多元文化的展演，我們一方面需要循著歷史去了解它的過去，一方面需要接受且期待它所有可能的、開放的未來」。<sup>24</sup>我們並非刻意收編中國作者的文學作品，將它們吸納為台灣文學，而是陸生書寫的內容的確挑戰了「台灣性」與台灣文學的邊界，提供的是一種關於「台灣性」的換位思考角度。

藍佩嘉與吳伊凡在關於旅中台生的認同研究中歸結，「生活在中國的台生，既被視為流離的國族和家人，又常感受到因台灣人身分而被視為他者，更明顯地處於『中介之閼』的曖昧矛盾位置」。<sup>25</sup>陸生書寫中也常常出現類似的「中介之閼」的衝突與曖昧，既認為台灣是中國的「家人」，又感受到自己在台身為少數他者的尷尬。目前華語語系研究(Sinophone Studies)較少關切中國大陸文化與華語語系文化之間的互動，陸生書寫或許可以稍微補足這個缺口，為目前台灣文學領域的中國論述，提供一個新的方向與參考觀點。

### 三、陸生的「台灣夢」

探究陸生來台求學的動機，大多出於他們對台灣的美好想像。尤其是第一屆陸生，面對台灣「三限六不」<sup>26</sup>的枷鎖，卻毅然選擇到台灣就讀，對台灣的嚮往占大部分因素。陸生的家庭背景主要來自「相對較發達的沿海及中部八省市的戶籍人口，而其中不少陸生都來自軍公教家庭，不但衣食無虞甚至有的家境優渥」。<sup>27</sup>張怡微成長於上海工人新村，而蔡博藝生於甘肅，後遷居浙江，父母親均是大學教授。這樣的沿海都市生長背景，讓他們較容易接觸到從台灣

23 史書美，〈有關華語語系研究的四個問題〉，《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7.06)，頁74。

24 同註23，頁75。

25 藍佩嘉、吳伊凡，〈在「祖國」與「外國」之間：旅中台生的認同與畫界〉，《台灣社會學》22期(2011.02)，頁51。

26 「三限」指的是限校、限量、限域。「六不」指的是不加分、不影響台灣學生就學權益、不編列獎助學金、不允許校外打工兼職、不會有就業機會、不得報考公職人員。

27 張可，〈「自由祖國」還是「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旅台陸生的認同、情感和意義建構〉，《中國大陸研究》62卷3期(2019.09)，頁126。

傳入的文化商品。一般陸生對於台灣的想像，多出自他們早期在中國的「台灣經驗」：中國八〇後世代對台灣流行文化的熟悉感、在中國所接受的教育、以及中國交換學生與中國遊客對台灣的描述，形構了中國人的台灣想像。大部分的陸生書寫都或多或少提及作者來到台灣以前，對台灣過度美化的幻想，這些片面的，片段的，對台灣的正向解讀與他們親身居住在台灣之後所感受到的生活落差，成為陸生書寫的一個重要關照點。

《陸生元年》中以中國的「台灣情節」<sup>28</sup>來描述中國對台灣的美麗幻想。台灣在1980年代以來，對中國大陸的文化影響，無論是文學、電影、電視或流行音樂，都成為中國八〇年代至九〇年代出生年輕一輩建構「台灣情節」的重要元素。中國的「台灣情節」可被視為一種「中國化」（Sinicized understanding）的台灣觀。以文學而言，1980年代，中國開始了第一波所謂的「台灣文學熱」，許多台灣作家的作品陸續進入中國，並獲得熱烈迴響，例如：三毛、瓊瑤、白先勇。2006年起，中國的世紀文景出版了華語作家系列叢書，再次引進港台作家作品。2008年，開放陸客來台前後興起了第二波「台灣文學熱」，張大春、駱以軍、龍應台、朱天心、朱天文成為中國年輕世代中耳熟能詳的「台灣作家」。<sup>29</sup>這些成功進入中國市場的台灣作家大多屬於外省背景。而本省作家或是原住民作家在這兩波「台灣文學熱」中則刻意被忽略。只有少數本省作家，例如吳念真，成功進入中國市場。因此，中國讀者的「台灣文學」想像可說是以外省作家為中心建構而來。身為文學評論者的張怡微曾這樣敘述中國大陸的台灣文學：「對於台灣人而言的『台灣文學』，與後來在大陸興起的『台灣文學熱』中的『台灣文學』，還不是同一件事」。<sup>30</sup>她認為，第二波的「台灣文學熱」形塑了年輕人心目中的「台灣夢」。

28 黃重豪、賈士麟、蘭桃、葉嘉興，〈台灣，故鄉或異鄉〉，《陸生元年》，頁147。

29 梁靜，〈第二輪台灣文學熱是如何形成的？〉，《新快報》，2014.05.16，B09。

30 張怡微，〈我視野中的「台灣文學」〉，《壹讀》，2016.11.20（來源：<https://read01.com/zh-tw/gaao8B.html#.Xjs5OmQzYUs>，檢索日期：2020.02.03）。

台灣的影視作品（特別是台灣偶像劇與綜藝節目）<sup>31</sup>及流行音樂（例如：早期的羅大佑，近年來的周杰倫，王力宏）更成為八〇甚至九〇後中國世代的共同台灣印象。長期沉浸於台灣的大眾文化中，使中國年輕世代想像自己（中國）與台灣是文化的共同體。張怡微在〈漂浪與抒情〉說到：「而對大陸人來說，台灣是民國夢，是電影、音樂，是避世樂園，就連美食都成為一個非去不可的理由」。<sup>32</sup>家庭背景與台灣沒有關聯的張怡微自陳她選擇到台灣讀書就是受到「台灣夢」的影響。她曾經「去過三次鹿港，為了憑弔一首歌：兩次九份，為了兩部電影：一次墾丁，為了太平洋的夢」。<sup>33</sup>

中國年輕世代的「台灣情節」不僅源於台灣大眾文化的影響，更深植於一般中國人心中的，是共產黨宣揚的大中華國族主義（Chinese nationalism）教育。誠如張可的觀察，「在中國的國族教育中，台灣從來都是『祖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使得相當一部分大陸人產生了錯覺也認為台灣的國族認同與自己相差無幾」。<sup>34</sup>也是陸生作家的劉二囍在他的《亞細亞的好孩子》書中，直接點出他對台灣與中國關係的想像：「大陸和台灣無論是兄弟，還是兄妹，都是緊密相連的一個大家庭，不管我傾心於誰，最終的落點都還在華夏大地」。<sup>35</sup>許多陸生書寫也呈現出以同胞手足為基礎的認知，認為台灣是一個比中國更具傳統中華文化的模範中國，甚至將台灣美化為「理想祖國」的藍圖，<sup>36</sup>期盼中國的未來走向「文化台灣化」，但此「台灣化」並非台灣的「本土化」與「主體化」，而是依附於大中華文化框架下開展的，未經文化大革命破壞，保存並發揚中國文化美德的「中國」。這樣的台灣想像，較接近戒嚴時期國民黨宣揚的中國國族及文化認同。

31 值得一提的是從2004到2016由小S和蔡康永所主持的談話性綜藝節目《康熙來了》。由於節目中常討論敏感禁忌話題，因此在中國被禁播。但《康熙來了》卻成為中國年輕世代了解台灣的重要管道。在中國學生族群成為受歡迎的節目。以筆者親身的教學經驗為例，筆者從2011年以來，每年接觸到約100位從中國到澳洲就讀大學的學生，大部分的中國學生說到台灣議題都會提到《康熙來了》，他們看到影片的來源多是同儕間「翻牆」收看台灣電視節目。

32 張怡微，〈漂浪與抒情〉，《都是遺風在醉人》（中國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13.09），頁44。

33 同註32。

34 張可，〈「自由祖國」還是「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旅台陸生的認同、情感和意義建構〉，《中國大陸研究》62卷3期，頁110-111。

35 劉二囍，《亞細亞的好孩子：一個大陸學生視野下的台灣》（台北：信實文化，2013.05），頁78。

36 同註35，頁106。

當台灣的「本土化」運動重在與戒嚴時期國民黨所倡導的中國認同進行切割的同時，中國的大中華國族主義把台灣文化內化為中國文化，因而許多年輕世代把對當前中國政治文化的不滿，轉向情感上傾慕自由民主的台灣。對他們而言，台灣是含括在大中華共同體中的另一種文化、政治選擇。胡俊峰與張可同時都點出這一群體相似的文化認同傾向：「台灣」對他們而言不只是中共當局所稱的國土的一部分，更是一種懷舊情感的投射。胡俊峰直言，中國人對台灣人產生了「一廂情願」的情感。<sup>37</sup>這或許解釋了2000年以後中國出現的「民國熱」與「台灣熱」。中國許多人對當前政治與社會的不滿，轉向於懷想前朝的美好，認為台灣是民國的延續，因此他們認為「台灣文化」體現了當代中國所缺乏的「民國範兒」。<sup>38</sup>蔡博藝在《我在台灣，我正青春》不止一次提及了中國人（她）對台灣與民國之間的美好想像連結，她在後記中說到：「前幾年大陸流行起了以『民國往事』為題材的書籍，一股民國風吹遍大江南北。很多人將對於上世紀二三〇年代的好奇與懷想寄託在台灣身上，而台灣變成了大陸人心中民國風範的活體標本」。<sup>39</sup>

中國人自1980年代以來建構起對於台灣的「深情款款」在2008年開放陸客團來台觀光，2011年陸客來台自由行之後，他們想像中的台灣似乎得到了眼見為憑的印證。蔡博藝在書中提到，她到台灣求學的動機始於2010年的台灣旅遊經歷，她對台灣的「真」印象深刻：「飯菜的真材實料」，「人們的真誠善良」。「因著台灣在我腦海中留下的純真，我喜歡上了這個綠色的海島」。<sup>40</sup>在自由行陸客的出版作品中，尤以新周刊出版的《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和新生代網路作家韓寒2012年在部落格發表的短文〈太平洋的風〉影響為最。韓寒的文章，描述他在台灣旅行途中在眼鏡行與計程車上的經驗，引起大量中國網民的迴響。他感謝台灣和香港，「庇護了中華的文化，把這個民族美好的習性

37 胡俊峰，《台灣不是我的家：陸生在台的認同衝擊》，頁85。

38 「民國範兒」指的是民國時期一種高雅，有品味的人文氣質與文人精神。

39 蔡博藝，〈對看對岸〉，《我在台灣，我正青春：第一屆陸生來台求學記事》（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11），頁247。以下引用此書，以《我在台灣，我正青春》稱之。

40 蔡博藝，〈我們只是不小心翻動了歷史〉，《我在台灣，我正青春》，頁4-5。

留下來，讓很多根子裡的東西免於浩劫」。<sup>41</sup>韓寒的台灣想像（一如蔡博藝在《我在台灣，我正青春》自序中提及台灣「追根溯源也是連著大陸」）<sup>42</sup>反映出中國年輕世代的對台灣的期待：將台灣文化置放在廣泛的大中華文化架構中，認為「中華文化」有一個既定的模式與標準，而台灣成為這個標準下最好的典範。這樣的單一中國性的台灣想像，可與杜維明（Wei-ming Tu）〈文化中國〉這篇文章中提出的概念相呼應，認為中國本土以外的華人社會，例如台灣，香港或新加坡，亦能成為引領中華文化方向的指標。杜維明以「邊緣即中心」<sup>43</sup>作為文章的副標題，旨在去中心化中國的文化霸權，但杜維明的理論仍建立在中心／邊緣的框架中，這樣的論述架構忽略台灣的主體性，僅僅單方面的認定台灣文化承載著保存傳統中華文化的責任，解嚴後台灣文學強調的眾聲喧嘩則被消音。

#### 四、重構「台灣」

伊恩（Ian Rowen）研究中國旅行團對兩岸民眾的影響，他認為「開放陸客來台後，陸客對台灣的孺慕之情（admiration）與認同感（identification）跟台灣民眾對陸客的疏離感（alienation）形成強烈對比。陸客盛贊台灣人的善良有禮，將其理想化為台灣人中國性的展現，但另一方面，台灣人則盡量躲避陸客，更加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sup>44</sup>這樣「中國性」與「台灣性」的對比理解，亦體現在台生與陸生的日常交往中，尤其以在台的學位生感受最深。不少關於陸生的研究都提及「認同劃界」的問題，認為陸生與台生相處時，「大陸學生會將自己與台灣劃在一起，台灣學生則傾向把大陸學生劃出去。於是劃界與劃界之間，就形成無可避免的認知衝突」。<sup>45</sup>認同劃界透露出劃界者對自身主體性的認知與宣告。擁有美好台灣想像的陸生實際生活在台灣之後，面對

41 韓寒，〈太平洋的風〉（來源：<https://tw.weibo.com/hanhan/3444080325144954>，檢索日期：2019.05.10）。

42 同註40，頁4-5。

43 Tu Wei-ming, "Cultural China: The Periphery as the Center," *Daedalus* Vol. 120, No. 2 (Spring, 1991), p.1.

44 Ian Rowen, "Tourism as a Territorial Strategy: The Case of China and Taiwan,"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46(2014), p.73.

45 黃重豪、賈士麟、蘭桃、葉家興，〈劃地，但不自限〉，《陸生元年》，頁225。

台灣人的劃界，無可避免的感受到強大的文化衝擊。張可在他的研究中指出，面對台灣人的劃界，陸生情感上受到的傷害是這一群體共同面臨的問題。<sup>46</sup> 面對這樣的情感傷害，隨之而來的是「台灣夢」的破碎與重構。而書寫不單單是作者與讀者的對話，也是作者自我審視的過程。借由書寫，作者不斷尋求兩岸認知差異的平衡點以及在台灣的自處模式。

### （一）在劃界與歸屬之間

在分析蔡博藝的《我在台灣，我正青春》之前，需要強調的是，這本書出版於2012年，因此呈現的是作者初到台灣的觀察與心境，亦反映出台灣與中國兩種文化的碰撞，對於初到台灣的陸生所造成的心理衝擊。書中許多她對台灣的評價，偏向於護衛她原本在中國建立起的認同價值，對照蔡博藝後來對台灣社會運動的積極投入，表現出許多相異之處。<sup>47</sup> 這樣的差異，反映出認同價值會因時因地而產生轉變。由於蔡博藝之後並未發表其他的作品，因此我們無從藉由文本，分析她的認同轉變歷程，但此書已呈現作者在台灣第一年對原本國族認同與自我認同的反思。

蔡博藝在書中的第一章〈我在台灣，我正青春〉談到她到台灣之後受到的劃界衝擊：「我已經習慣了台灣同學稱我是中國人，我也不再去爭辯些什麼。聽到他們這麼稱呼時，心裡不是沒有波瀾，但是我現在已經沒有立場和動機，去賤賤的反問一句：『你不是中國人嗎？』他們的確不這麼認同。我最多會弱弱的說一句：『叫我大陸人。』」。<sup>48</sup> 雖然表達對於台灣人將她排除在外的不滿，在自我劃界與被劃界的過程中，作者似乎終能接受，自己在台灣是「不折不扣的異鄉人」（《我在台灣，我正青春》，頁171）。但作品中仍透露出作者對於定義台灣與中國關係時，在「劃界」（*exclusion*）與「歸屬」（*inclusion*）之間的情感矛盾。情感上，作者仍表達出台灣為大中華文化圈一

46 張可，〈「自由祖國」還是「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旅台陸生的認同、情感和意義建構〉，《中國大陸研究》62卷3期，頁104。

47 2014年，蔡博藝投入淡江大學學生會的選舉，由於是第一個以中國籍選舉會長的候選人，引發軒然大波，甚至導致中選會介入。她也是傅榆2019的得獎紀錄片《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的拍攝對象。

48 蔡博藝，《我在台灣，我正青春》，頁18。以下引用此書者皆於引文後標明書名及頁碼。

員的信仰，企圖強調兩岸之間的情感牽繫，但在比較兩方文化時，又常常浮現她對台灣在地文化的誤解。對於台灣的民主政治，作者並未如台灣人所期待的，產生仰慕之情，反而時常提出批判，期待讀者去同理她所愛的中國。

與大部分的陸生書寫相似，在反駁台灣人切割中國認同之際，另一方面，《我在台灣，我正青春》正是構築於台灣—中國對比的架構下。這本書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青春在台灣〉以中國讀者最熟悉的「情感」為出發點，強調台灣與中國斬不斷的連繫，第二部分〈兩岸對照記〉提出作者對台灣與中國文化差異的看法，第三部分〈熱血看台灣〉收錄了作者關於台灣政治運動與制度的評論，第四部分〈理想的旅行〉則記錄了作者的台灣遊記。當書中以抒情為主軸時（第一部分與第四部分的〈台南人家〉一章），便浮現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或「台灣和中國是共同體」的「兩岸一家親」想像。最具體的例子是書中所描述的台灣外省人。外省人是書中描述「台灣人」時，最常被提及的族群，作者甚至用了兩章敘述她與兩個外省家庭相遇的故事。很巧合的，這兩個家庭正好來自作者的故鄉甘肅與浙江。讀者無從得知，是否陸生在台灣的交往群體多為外省族群，<sup>49</sup>或是蔡博藝有意的主題選擇，但這兩則故事，特別是第一部分的〈名為家鄉〉，展現她對「台灣人」的解讀。故事描述她到台電勵進食堂吃飯，偶然得知餐館老老闆石老爺子來自她幼時家鄉甘肅蘭州，作者內心激動不已。與石老爺子聊天的過程中知道他每年回蘭州，更付出很多心力幫助家鄉的親人，作者深感自己對家鄉的「愧疚」並佩服著這個「執著的喜歡著」故鄉的長者。雖然蔡博藝自陳，「我離開老家蘭州已經快十年了，期間只回去過兩次，我對於那個西部城市快沒有概念了」，但文中她仍技巧性地將自己與石老爺子的情感拉在一起，說道「*我們*很自然的聊到了*我們的*家鄉」（《我在台灣，我正青春》，頁46），<sup>50</sup>以此強調這個中國家鄉是他們共同的記憶與經歷。而台灣的石老爺子比她——一個在中國長大的中國人——更熱愛家鄉。以相似的筆法，第四部分的〈台南人家〉描述她在台南的旅遊經驗：她所遇到的接待家庭是從浙江跟隨國民政府到台灣的外省人。與石老爺子相似，

49 張怡微在相關的台灣作品中，的確提及台灣的外省族群是對陸生相對友善的群體。

50 引文中的「我們」斜體是筆者特意的強調。

這個台南家庭的外婆每年回中國探親，對家鄉的親人「傾囊相助」，修祖墳蓋房子（《我在台灣，我正青春》，頁216）。蔡博藝在書中描述的外省家庭返鄉故事，與二代外省作家蔣曉雲在2011年出版的小說《桃花井》<sup>51</sup>中李謹洲一家人的故事極為相似，但蔡博藝的書寫明顯缺乏了蔣曉雲書中對兩岸文化與金錢觀差異的犀利見解：蔣曉雲認為李謹洲對大陸親人的慷慨其實包含了複雜的自我滿足、對人生缺憾的補償與利益的交換，而蔡博藝則將第一代外省人與家鄉的關係簡化為對家鄉的愛與他們的「善良」（《我在台灣，我正青春》，頁216）。即便書中提及石老爺子感慨家鄉人情的冷漠和金錢的糾紛，敘述石老爺子資助的姪子對他不理不睬，他因而感到心寒，但作者並未提出批評，反而更加強調老人家對家鄉的「執念」（《我在台灣，我正青春》，頁50），企圖映襯，無論家鄉親友如何對待老爺子，他對家鄉不變的深厚情感。

然而，當脫離「情感」的主題，回到理性的文化與政治觀察時，蔡博藝的書寫結構就轉變為台灣與中國的比較、對比、甚至抗衡。雖然如同上一段所言，這樣的台灣—中國對比是陸生書寫中常見的架構，但這樣的架構透露出作者對台灣與中國對立關係的認知，顯示作者有意無意地承認，台灣與中國是兩個不同的文化與政治個體。名為〈兩岸對照記〉的第二部分涉及蔡博藝對於兩岸跨海戀情、學歷認知、陸劇台劇對比和言論自由的看法，多屬文化觀察的範圍。書中的這部分有許多對台灣文化解讀上的謬誤或是流於天真的評論，顯示作者即使身在台灣，對台灣本地文化仍多疏離與誤解。例如在介紹台灣的「本土劇」時，她敘述：「早期的本土劇基本上都是國語，講的大都是眷村故事，比如《再見，忠貞二村》《光陰的故事》等劇，都大受好評」（《我在台灣，我正青春》，頁107）。蔡博藝所列出的「眷村懷舊電視劇」<sup>52</sup>顯然與台灣觀眾所認知的「本土劇」或「鄉土劇」相去甚遠。而在介紹台灣的大陸配偶時，她以模糊的時間界線來定義這一群體：「她們中的大部分人都是一九四九年之後來到台灣的，其中女性超過八十四%」（《我在台灣，我正青春》，頁

51 蔣曉雲，《桃花井》（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2011.04）。

52 楊乃甄，〈當代台灣「外省懷舊電視劇」的文化政治〉（台北：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81)。以「後1949」來定義陸配，顯然在不同時間點來到台灣的外省族群與陸配群體，在她的眼中並無差異。事實上「後1949」包含了1950年代來到台灣的外省移民，他們的文化認同和政治認同與生長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後因為婚姻來到台灣的陸配已有顯著不同。書中的這些謬誤所折射出的意義是，即使蔡博藝在書中極力展現她在台灣的融入良好，陸生群體實際上與台灣的某些族群，特別是人口比例占最多的本省族群，在生活上的脫節。作者所提及的主要往來對象多是陸生、陸配、<sup>53</sup> 外省族群或對中國有興趣的人。這些人是書中最常見的「台灣人」，而作者在台的台灣文化印象，大多建構在此人際網路上，或是藉由這些群體間接得知的「台灣文化」。這是當前的陸生研究中尚未提及的觀察。

研究在台陸生心境的轉變，張可提出了一個兩極化的看法，認為大多數陸生在台灣遭遇到認同挫折之後，引發負面情感，反而轉向更傳統的大中華民族主義，積極防衛中國的「國族與價值認同」，甚至產生反台灣情緒。只有少數人能夠超越過去的國族與民族情感，對台灣的價值產生同理心，進而建立新的認同。<sup>54</sup> 筆者認為，張可的看法過於傾向二分法，將人性的複雜簡化，亦忽略了認同的變動性。正如筆者在本節之初提及的，蔡博藝在出版此書之後，她對台灣社會運動的投入明顯呈現她對於民主觀點的轉變。但在張可所提出的兩極化光譜中，蔡博藝的《我在台灣，我正青春》卻較接近大部分陸生的心理反應，尤其是在觀察台灣民主制度時，作者並未給予肯定，反之，她以諷刺的語氣評論台灣年輕一代對民主自由的過度驕傲，認為「很多人很愛很愛台灣，愛到快要眼裡揉不進沙子」（《我在台灣，我正青春》，頁131）。雖然對「民主」與「自由」的基本價值表示認同，但是書中傾向批判民主制度對台灣社會所造成的負面影響，認為在台灣民主制度下成長的多數年輕人比起中國大陸的年輕人，顯然缺乏國際視野，「他們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裡。這和在牆內伸著脖子看世界的內地人比起來，真的弱爆了，後者至少渴求外面的世界，而

53 在書中的第二部分，蔡博藝用了兩章描述陸配在台灣的感受。

54 張可，〈「自由祖國」還是「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旅台陸生的認同、情感和意義建構〉，《中國大陸研究》62卷3期，頁104。

前者，世界明明向你敞開，你卻要別過臉去，把自己堵在牆角」（《我在台灣，我正青春》，頁133-134）。觀察文林苑都更爭議時，她以「五味雜陳」（《我在台灣，我正青春》，頁142）來表達內心的掙扎，一方面同情王家對於土地的情感，另一方面也同理其他36戶的處境，但她似乎認為民主制度與對個人產權的過度尊重只會延宕應該有的都更進度，讓台北無法現代化：「在這場風波之中，沒有任何一方得利，沒有一個人覺得開心。而事端的製造者在攪起了這潭渾水後，發現無法控制，於是便悄然沉寂。新修訂的法規也無法溯及既往，解決的辦法似乎只有拖延」（《我在台灣，我正青春》，頁148）。無論是台灣的社會運動或是法律制度在作者眼中都成為延宕都市發展的主因。在〈機關的機關〉與〈我所見的台灣學生會〉中，她同樣對台灣看似「民主」和「和善」（《我在台灣，我正青春》，頁182）的社會制度所衍生的缺乏效率提出負面評價。

在〈簡單的常識〉一文中，她以一位陸配媽媽的想法為例子，總結了她對「民主自由」價值的感受，認為「只要老百姓過得好，誰上台執政都一樣」（《我在台灣，我正青春》，頁120）。以簡化的「老百姓過得好」的模糊概念，加上她對台灣政治制度的觀察，蔡博藝回頭評論中國，思考中國民主自由的必要性，質疑是否「民主自由」真能帶來經濟上與民生上的改善：

最近接觸了很多關於民主自由的話題，看到網路上關於兩岸政治的議題越吵越熱烈，中國是否到了非民主不可的時候呢？不自由，毋寧死！這樣的論調也不少。可是選票和我們的生活品質好壞是否真的密不可分？選票和我們口袋裡的鈔票究竟有多大的關係呢？而選票又離自由有多遠？（《我在台灣，我正青春》，頁121-122）

避開對共產黨獨裁政權的挑戰，她傾向用經濟面為考量來審視民主的價值，認為以台灣的例子而言，民主並不能帶來物質生活的進步。文中反而肯定中共政權對「言論自由」與「性自由」的貢獻，認為可以討論中國的不自由已經反映了中國在言論自由的進步（《我在台灣，我正青春》，頁122）。回到自身對

國族認同的思考，蔡博藝兩次以「這個國家」和「我的國家」來稱呼中國，期許它越來越好（《我在台灣，我正青春》，頁124-125）。而顯然，這個她所愛的國家指涉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包括台灣。蔡博藝書中以情感為基礎，建立起的兩岸一家親想像，在她對兩岸文化與政治制度差異的評述中顯得分外薄弱。當「同文同種」使語言與種族不成為阻礙溝通與認同的原因，《我在台灣，我正青春》呈現出的國族認同落差與文化誤讀更顯尖銳。

## （二）安為異鄉人

相較於蔡博藝在《我在台灣，我正青春》表現的熱血激昂，張怡微的《因為夢見你離開》顯得安靜沉穩。蔡博藝的書寫，表達出她對於被台灣人劃界於外的不滿，張怡微的書中則呈現她嚴謹的自我劃界，安置自己為「外人」。書中最常以「異鄉人」或「外地人」來描述自己在台灣的位置，相似的詞彙出現頻率高達13次之多。以求學的台北為中心，書中觀察了所謂的「異鄉人」，分辨了自己身為「中國異鄉人」與「本地異鄉人」的差別：「但異鄉人到底還是有能級之差，很多本地人並不會知道這種細膩的差別。到台灣以後，我一直在學習怎麼當外地人，外省人，生怕犯錯，被大做文章。至於台南人、彰化人、雲林人、澎湖人、金門人則對我一點差別也沒有，總之都是台灣人。但他們之間，卻似乎仍有遠近之別」。<sup>55</sup>但終究，她是異鄉人中的異鄉人。

當蔡博藝在情感上緊扣兩岸之間的血脈關係，張怡微書中的自我劃界反而跨越了兩岸政治性、民族性甚至文化性框架，著重在基本人性情感的觀察。在〈冷冷之初與冷冷之終〉中，她提及自己在台灣不斷地被錯認：即使她已經表明自己是「中國人」，卡車司機仍誤認她為越南人，而去中藥行買藥時，她被誤認為緬甸人。在不斷的被誤認之中，她開始意識到台灣這片土地上除了「中國人」以外，「複雜的前人足跡」與「歷史血淚」（《因為夢見你離開》，頁84）。張怡微的劃界，將孤單的「外人」劃在一起。她描述曾經有一天傍晚，在台中某一處空曠寂寥的十字路口，看到一群造路的工人，與他們素不相識，

55 張怡微，《因為夢見你離開》，頁110。以下引用此書者皆於引文後標明書名及頁碼。

但她卻感受到彼此的同在：「我們沒有見過彼此，但卻映照著彼此，顯得不那麼孤單。同樣蟄居，每一餐飯都為了活下去，同樣借著島嶼，浪擲著所剩不多的青春」（《因為夢見你離開》，頁84）。張怡微並未提及造路工人的國籍，但提到他們也「背井離鄉」（《因為夢見你離開》，頁79）來到這裡，字裡行間透露出這些人的移工身分，而她與他們短暫的相遇，沒有言語互動，卻因為同樣寄居在台灣認真的生活，使她產生了相互取暖的認同感。書中同樣來到台灣蟄居的還有〈夢裡不知身是客〉的陸生同性戀人麥扣和肯特，因為家人的不能諒解，而移居台灣，成為作者在台北這座城市裡的少數幾個朋友。同是「外人」——主流性別角色中的外人，也是國籍上的外人——這對戀人，成為作者劃界中的朋友。台灣的「非台北人」也被張怡微劃入所謂「外人」的行列，因為他們「覺得台北人有點冷漠」（《因為夢見你離開》，頁49、109），因而較願意跟陸生當朋友。〈因為夢見你離開〉裡，用功節儉，經歷過家人在九二一大地震中離世的學妹小蓓即是這樣一個孤獨的台南異鄉人。這群「外人」沒有特定的國族、種族、性別認同或者是文化區分，在書中成為一族，只因為他們在台灣（或台北）感受到一樣的孤單。

建立在「外人」身分上，張怡微的《因為夢見你離開》一直圍繞著「孤單的旁觀者」這一主題。得到聯合報文學獎的短篇小說〈奧客〉具體化這樣的「外人」意象。故事主要圍繞在社區照相館老闆何明與他的老客戶老賈之間，陳述老賈是個外省老兵，表面上愛家愛孩子，每個月會拿一張家庭照片給何明修片，做家庭相本。由於他常來何明店裡聊天，卻只洗一兩張照片，被何明的妻子春麗認為是「奧客」。而老賈在何明店中隱藏著多年的秘密，是他年輕時期的情人。他請何明幫他的情人做了一本相本，在他過世後，請何明送到情人的手中。

這篇小說呈現出多重「外人」的意象。一方面，張怡微在書寫策略上，刻意弱化了政治意符，她選用了相當「台灣」的詞彙「奧客」來表達這是一個台灣的故事，再者，由春麗坐的交通工具「捷運」，老賈的「退伍老兵」身分，以及春麗對他「以前做匪諜的出身」（《因為夢見你離開》，頁30）的評價共同暗示著這個故事發生的地點在台灣。但張怡微並未因為這是一個發生在台灣

的故事而刻意模仿台灣習慣的敘事筆調。相反的，她選擇中國的敘事法與習慣用語，例如：二婚、公交車、打印機、小區來暗示敘述者身為台灣外人的觀察者身分。另一方面，在故事情節寓意上，何明代表的，是老賈家庭與生命中的「外人」。除了透過照片影像去了解老賈的生命，何明幾乎從未參與過老賈的任何人生經驗，亦非他的重要他人，但卻又對這個「朋友」充滿超過家人的理解與同情：何明在老賈的追思會上哭了一場，「通宵達旦」趕出家庭相本只為了安慰老賈的家人，但他的家人只說了謝謝，連翻都沒翻開（《因為夢見你離開》，頁35）。何明與老賈的交情，似乎映襯出作者對台灣的感受。張怡微在書的後記中說道：

我覺得我和台灣的关系，就像是與一個人的相處。我漸漸從認識變得認得，知道了他人之為人的善良、為難與苦衷。而他也知道了我的偏見與固執。我們的緣分看似那麼深，那麼偶然，足以使我隔海揮霍青春；我們的緣分又那麼淺，每一年都是赤裸裸的倒數計時，每一次相逢都可能是為了告別。（《因為夢見你離開》，頁200）

以人與人的相處來形容作者與台灣的关系，似乎可以以何明與老賈「偶然」卻又「深刻」的關係相互呼應。張怡微因為暫居台灣，對這移居地產生深厚的感情，甚至某程度理解台灣這片土地上的悲和喜，但對作者而言，終究這是生命中短暫的相遇。張怡微在〈楔子：水城一春今日盡〉這樣總結她對台灣的情感矛盾，「我原以為台北是我人生裡的一鱗半爪，後來才覺醒我對台北來說連一鱗半爪都不是」（《因為夢見你離開》，頁21）。張怡微的《因為夢見你離開》裡的篇章，幾乎都在描述生活在台灣的人的故事，但卻從未定義這些角色為代表「台灣人」的樣貌，相反的，每一章裡出現的人物，都是個體，都是邊緣，都不代表「台灣」，卻都與她在台灣相遇，然後交錯而過：正如她所言，「我是異鄉人，最不缺路過」（《因為夢見你離開》，頁117）。她筆下的台灣人，不具任何「典型」。

進一步深究張怡微書中的「台灣」，中國國族的政治意象幾乎全被抹去，

除了描述不代表「台灣人」的「住在台灣的人」之外，她的台灣印象也呈現在中性化的自然書寫中。全書只有第一章〈楔子：水城一春今日盡〉具體描繪了作者眼中的台灣：「它不是國，不是省，不是市，不是社區」而是「島嶼」，一種屬於自然地理的劃界方式（《因為夢見你離開》，頁2）。她所描述在台灣，是濱海公路上看到的海，是台北清朗的早晨，午後的大雨，陰鬱的雨季，蒼鬱的山。在台灣孤獨的生活中，她「要比在故鄉時更為親近大自然一些，也親近自己」（《因為夢見你離開》，頁8）。從北方來的張怡微，稱她在台灣四年所見到的蟑螂，「超過了前二十四年的生命累積的全部」（《因為夢見你離開》，頁19）。身為移居到亞熱帶小島生活的上海人，最真實的「在地經驗」（《因為夢見你離開》，頁21），竟是台北的多雨天氣，惱人的昆蟲，與隨著季節上檔的水果：荔枝、草莓、愛文芒果、珍珠芭樂。在整本描述「台灣的人」的作品中，倒數第二章〈我彷彿是在對你們講一個夢〉卻突兀地插入一篇難以稱為故事的故事，沒有情節，卻有主角的名字家宜，描述他對於鯨的迷戀。從文學史，歷史與自然史中去探究台灣與鯨豚的關係，還有已被遺忘的台灣捕鯨史。描述人與自然的關係中，兩岸政治的人為劃分，在張怡微的書中幾無重量。

解構了兩岸關係的二元論述框架，也未將台灣包含在大中華文化的同心圓之中，張怡微對於「陸生」這一特殊中介身分，有一番不同解讀。〈而吃菠菜是無用的了〉是目前極少數描述陸生的短篇小說。相較於蔡博藝的書中，聲稱陸生只是「不小心翻動了歷史」（《我在台灣，我正青春》，頁4），張怡微的〈而吃菠菜是無用的了〉中，陸生主角成了20世紀兩岸錯綜複雜政治關係中的歷史載體。故事描述23歲的失意陸生主人公勁吾回到中國家鄉過年的經歷。在台中就讀法律系碩士班，勁吾說不上喜歡台灣，也不認為他的人生因為去了台灣而有任何進展。在全文的四個部分中，作者就用了前三個部分鋪陳勁吾的苦悶：情場失意，學業表現差強人意，與大伯關係的劍拔弩張。在第四部分讀者才恍然大悟，主角所有愛恨情仇的來源，皆因為他的台灣爺爺。他的台灣爺爺是國共內戰時期跟隨國民政府遷台的國民黨軍人，晚年因為身體不好決定落葉歸根回到家鄉。由於他在中國已經舉目無親，台灣爺爺的摯友將自己的小兒

子，也就是勁吾的父親過繼給他，因此建立了一個沒有直系血緣的非典型家庭。勁吾的大伯早先放棄過繼給台灣爺爺的權利，其後卻眼紅這個老人資助勁吾讀書，處心積慮想從勁吾家要錢。而勁吾到台灣讀書的決定，也是聽從台灣爺爺的建議。有別於張怡微自己當初到台灣求學的熱切「台灣夢」，主角勁吾對台灣沒有幻想，去台灣求學的原因僅僅因為台灣爺爺的鼓勵以及金錢資助：「爺說，好，開放了都好，要去，以前的人去不了，勁吾去了，回來，就會了不得」（《因為夢見你離開》，頁162）。台灣爺爺以他的兩岸人生經驗，支持勁吾前往台灣唸書，但隨之而來的卻是家族的不和，大伯的「覬覦、隔閡、紛爭」（《因為夢見你離開》，頁162）。而勁吾的台灣學位，也未如台灣爺爺想像的一般值得。勁吾離鄉背井的求學經歷，代表的不是勝利與榮耀，而是「大到簡直不知從何說起，大到快要淹沒家中全部的苦衷與為難」（《因為夢見你離開》，頁153）。陸生到台灣求學，在這個故事中成了國共內戰的殘跡，上世代留給下一代的包袱；對主角勁吾而言，是難以承受之重，但之於他的人生，卻無法產生實質的價值與意義。

張怡微對這個返鄉定居的台灣爺爺的描述，也明顯異於蔡博藝以鄉愁為情感依歸的論述，採取較接近蔣曉雲《桃花井》中的解讀。中國家鄉之於他除了落葉歸根，似乎沒有更多的意涵。金錢是他能夠託付身後事的確據，而所謂的親情，只不過是認識一群新的人建立起的新關係。從勁吾的觀點敘述台灣爺爺：「這個世界上，他認識的人都死了；現在認識的人，都是新的。他也不想再認識更新的人了，他也可憐」（《因為夢見你離開》，頁163-164）。在張怡微筆下，外省人的返鄉已非返歸一個摯愛的故鄉這麼簡單，而是重新開始一個不是那麼滿意的新生活的決定。而陸生主角到台灣求學，也非完成一個夢想這麼簡單，而是在複雜歷史脈絡中，接受一個不是那麼滿意，也不是那麼能理解的安排。勁吾與台灣爺爺，在兩岸之間，一來一往，沒有哪一方回到哪一方的滿足感，兩人的夢想都沒有完滿，充滿著複雜而苦澀的情感。

## 五、結論

對比中國的台灣夢，蔡博藝與張怡微的作品展現作者對於台灣想像的重

構：相較於蔡博藝《我在台灣，我正青春》在政治與情感之間的游移不定，以兩岸對比架構去思考台灣的政治制度在中國的可行性，進而更反思自身的中國國族認同，張怡微的《因為夢見你離開》自我定位為「外人」，用少數「他者」的眼光去觀察她所體驗的台灣。書中敘事刻意脫離「兩岸」的框架，以去政治化，去中心化的想像，拼湊出大部分陸生書寫中不曾注意到的「非典型台灣」，以此達到去理想化台灣的效果。張怡微與蔡博藝在相近的時間點來到台灣，作品中建構的台灣想像卻大異其趣。但兩部作品同樣可被視為作者自我「他者化」的表徵，是一種陸生認識台灣主體性的過程，反映在作者劃界的位移上，他們不再將自己與台灣劃在同一疆界，而是試圖將自己重新劃界於台灣之外（例如《因為夢見你離開》）或者至少承認在政治上文化上台灣與中國的互異（例如在《我在台灣，我正青春》）。它們重新定義了作者的國族與文化認同——認同一個不將台灣包括在內的中國。

張可在他的研究中憂心在台陸生面對台灣的主體性，會產生更強大的「中國民族主義」，甚至對台灣產生「報復心態」。<sup>56</sup>就本文探討的兩文本而論，面對台灣的主體性，雖然兩作者均感受到強烈的文化衝擊，但筆者認為這樣的「幻滅感」有助於兩岸進一步的相互了解。兩部作品對台灣的想像，從單一到多元，從「中國性」到「台灣性」，解構了中國目前仍廣為流傳，理想化的、中國國族主義的台灣風貌。這兩部風格迥異的作品反射出兩岸在1980年代開放交流之後，中國在文學上與文化上看待台灣的眼光仍顯得偏狹（台灣亦然）。陸生文學或許是中國文學的邊緣，也非台灣文學關注的文本，但陸生以「中介之閱」的特質，書寫出複雜且多元的台灣意象，為兩岸身分認同議題開拓出新的詮釋角度。

---

56 張可，〈「自由祖國」還是「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旅台陸生的認同、情感和意義建構〉，《中國大陸研究》62卷3期（2019.09），頁132。

## 參考資料

### 一、專書

- 史書美，《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7.06）。
- 胡俊峰，《台灣不是我的家：陸生在台的認同衝擊》（台北：獨立作家，2014.07）。
- 張怡微，《因為夢見你離開》（中國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15.01）。
- ，《都是遺風在醉人》（中國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13.09）。
- 章緣，《更衣室女人的告解》（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18.10）。
- 黃重豪、賈士麟、蔭桃、葉家興，《陸生元年》（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13.04）。
- 蔡博藝，《我在台灣，我正青春：第一屆陸生來台求學記事》（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11）。
- 劉二囍，《亞細亞的好孩子：一個大陸學生視野下的台灣》（台北：信實文化，2013.05）。
- 駱以軍，《遠方》（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2003.06）。
- 蔣曉雲，《桃花井》（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2011.04）。

### 二、論文

#### （一）期刊論文

- 王嘉州，〈短期來台交流陸生之社會接觸與政治態度變遷初探〉，《遠景基金會季刊》17卷4期（2016.10），頁1-42。
- 吳慧娟，〈文學敘事與人權想像：移民工文學獎〉，《中外文學》48卷3期（2019.09），頁89-132。
- 周祝瑛、楊雁斐，〈國際化另一章：第一屆畢業陸生滿意度調查初步報告〉，《教育研究月刊》259期（2015.11），頁27-38。
- 邱貴芬，〈新世紀台灣文學系所面臨的挑戰〉，《台灣文學研究》1卷2期（2012.06），頁17-29。
- 阿潑、葉佳怡，〈倖存者的行進——阿潑、葉佳怡的（小說家訪後）交換筆記〉，《文訊》13卷3期（2016.11），頁60-67。
- 張可，〈「自由祖國」還是「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旅台陸生的認同、情感和意義建

構》，《中國大陸研究》62卷3期（2019.09），頁95-142。

藍佩嘉、吳伊凡，〈在「祖國」與「外國」之間：旅中台生的認同與畫界〉，《台灣社會學》22期（2011.02），頁1-57。

Ian Rowen, "Tourism as a Territorial Strategy: The Case of China and Taiwan,"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46 (2014), pp. 62-74.

Tu Wei-ming, "Cultural China: The Periphery as the Center," *Daedalus* Vol. 120, No. 2 (Spring, 1991), pp.1-32.

## （二）學位論文

楊乃甄，〈當代台灣「外省懷舊電視劇」的文化政治〉（台北：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 三、報紙文章

梁靜，〈第二輪台灣文學熱是如何形成的？〉，《新快報》，2014.05.16，B09。

## 四、電子媒體

中華民國大陸委員會，〈陸生來台研修及修讀學位統計〉（來源：<https://www.mac.gov.tw/cp.aspx?n=A3C17A7A26BAB048>，檢索日期：2020.03.04）。

張怡微，〈我視野中的「台灣文學」〉，《壹讀》，2016.11.20（來源：<https://read01.com/zh-tw/gaao8B.html#.YDdUhm5uKHt>，檢索日期：2020.02.03）。

韓寒，〈太平洋的風〉（來源：<https://tw.weibo.com/hanhan/3444080325144954>，檢索日期：2019.05.10）。